

文章编号:2095-0365(2017)02-0082-06

近十年来中共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综述

殷梦洁, 孙炳芳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围绕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的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民族精神教育的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民族精神实践的当代启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关注抗战时期特定主体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较少系统地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族精神;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7.02.16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勇往直前,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对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能够有效展示学者们的研究状况,助于归纳中共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的成效与不足,对当今民族精神培育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一、学术界有关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内涵研究

民族精神是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江泽民指出:“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1]这一概括已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相互区别的具体特点的背后,总有一些共同的内容,有统一的

历史原貌。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文化结构,虽然会吸收、保留以往形成的某些意识形态的思想因素和材料,但在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经济结构。^[2]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受到战火的淬炼,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主,还有着自身特殊的时代内容。郜世奇认为抗日时期的民族精神还包括脚踏实地的求真务实精神,国共两党民主协商、携手为国的精神,忠于国家的重德精神^[3];李向军、危兆盖认为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还包括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4];熊德洋认为舍家报国的奉献精神、舍生取义的斗争精神也属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一部分。^[5]

二、抗战时期中共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研究

党在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起来的,因此学者们对教育实践的研究多以抗日根据地为例进行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以党员、军队和社会成员为分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殷梦洁(199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基金项目:2016年石家庄铁道大学创新项目(YC2016029)

本文信息:殷梦洁,孙炳芳.近十年来中共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综述[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2):82-87.

类,依据不同的教育主体,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与内容、教育途径等角度切入,对党在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培育进行了研究。

(一)党员的民族精神教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部分党组织成员面对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蛊惑,缺乏大局意识,思想上摇摆不定,政治觉悟较低。为增强党员的文化素质,坚定党员的政治立场和必胜信念,党决定在组织内部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实践活动,以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完善的教育制度是教育实践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党为了顺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活动,实行干部教育制度,辅之以在职干部教育政策,以期提升干部成员的文化素质与思想政治觉悟。朱童心指出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号召全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设置干部教育委员会为管理机构,对干部教育实践进行监督指导;并充分考虑干部队伍内部文化素养参差不齐的实际,设置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以期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6]此外,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制订了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制度。罗永辉论述了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少数民族干部教育政策: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之下,使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内部事务的能力;回蒙干部政策初步建立,“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尽力设法培养蒙民干部,其文化程度较高者,进步有为者,可送到边区受训。普通的干部,则由当地自办训练班,进行短期训练。’”;确立了“民族地区主要领导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产生,按照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配备干部,注重培养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部”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7]

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发展迅速,但由于党内成员的思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组织与基层群众相脱离,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因此,党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主,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时事政策教育、军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并采取了多种教学模式,以提升教育实效性。

康厚德以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为研究基点,指出在党员教育上,党中央要求全体党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摆脱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左”倾思想的干扰,肃清党内的错误思想。^[8]党中央认为应根据不同的革命时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布置党员的教育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要培育大批适应抗战形势的干部队伍,还要对广大的普通党员队伍进行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坚定党员的政治方向,肃清党内各种偏向,并对他们进行军事教育,锻造指导社会成员进行革命的基层力量。^[9]王艳春从干部教育的角度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思想:“中共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基础,以国防教育为教育方针,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战略思想和德才兼备的培养目标。”^[10]

吴宏亮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采取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党员教育,通过开展整风运动这一切合党员实际的教育活动,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1]在党员干部的培育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重要原则。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采取自主学习、民主研讨、巡回教学、“小先生制”等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10]在党员自身教育的过程中采取批判错误的修养方法,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11]强调党员要参与革命实践。

(二)对军队教育的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内主要矛盾转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红军的作战任务也转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为了使人民军队尽快适应作战任务,明了国内战争局势,党建立了各类军政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多种教育形式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培育军队成员忠于国家、不畏强权的思想,提高军队成员的思想文化水平,增强人民军队的抗战能力,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抗战环境的恶劣性、抗战任务的艰巨性都使人民军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特别是日军装备的超前性对抗日武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党中央设立不同层次的军队干部学

校、创建军队报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军事国防教育,提高军队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增强干部的军事领导能力,以使军队干部能够合理分析战争局势,制定正确的行军策略。^[12]为了使军队尽快适应战争形势并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政治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红军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证部队在改编后仍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13]在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强大以后,党指挥枪的原则就被反复强调,要求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此外,“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 灵魂”^[13],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磨军阀主义倾向,在军队中开展了整风运动,并“创造性地开展了尊干爱民运动和群众性练兵运动等民主实践活动”^[14]健全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传播了官兵平等的思想,聚拢了普通士兵的向心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 社会成员教育的研究

日寇在加紧对正面战场侵略的同时,对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诱骗、奴化教育乃至武装威胁,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磨中国人民热爱故土、自强不息、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面对社会成员思想摇摆不定的状况,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与民族精神教育,提升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水平,坚定社会成员的爱国主义信念,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者们对社会成员的民族精神教育研究分别从青年教育和儿童教育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中青年教育中尤以农民教育和妇女教育、知识分子教育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1. 农民教育的研究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人对农民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争取了农民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学者们着重从文化教育、经济支援、民兵建设这三个方面论证了抗战时期党对农民的民族精神教育成果。

李伟从冬学运动的角度出发,指出在文化教育过程中,党员干部把党的政治主张、战争的阶段性要求经常性的传递到农民中去,并结合抗日形

势,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相结合,普及文化知识,提升农民自身的认知和判断水平,促进了民众抗战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5]除了兴起冬学运动外,党中央还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民校,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和扫盲运动,运用墙报和黑板报的形式进行舆论宣传,将爱国主义、战争形势、党的方针政策潜移默化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有力地巩固了敌后战场。^[16]刘庆礼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为例,论述了抗战时期党在经济政策上对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在实行过程中将爱国主义思想与国家利益至上理念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仅保证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更稳固了敌后抗日战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援力量。^[17]姜涛以太行根据地为例详细论述了对农民的军事教育。半军事化的民兵自卫队是民众自觉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党组织通过爱国主义教育 & 政治宣传,使民兵部队向党组织靠拢。民兵部队的成立不仅维护了敌后战场,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

2. 妇女教育的研究

由于部分抗日边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浪潮影响甚微,封建社会时期的风俗陋习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整顿,使得在抗日战争时期,妇女权益得不到维护,安定后方根据地的作用被削弱。中央决定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学者们着重探讨了妇女的解放问题以及妇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问题,从侧面论证了党对妇女的民族精神教育成果。

孙瑞阳从农村妇女教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教育所做的工作,指出通过生产技术教育、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卫生常识教育等教育作为妇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促使了她们社会意识、自强意识、独立意识的提高,最终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曲晓鹏从妇女权益的角度,介绍了党通过制订相关的政策,使得妇女在政治上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思想上获得了大局观念,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文化上提高了知识水平,在经济上广泛的参加生产、逐步自立,在家庭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有力的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了抗日战争。^[20]

3. 知识分子教育的研究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队不仅利用各

种现代化武器践踏中华大地,更采取了灭亡中国的奴化政策。知识分子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与迫害,为此,党组织创建学校,吸纳知识分子入党参军,保护了知识分子群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21]毛泽东认为工农革命军只有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才能够提高自己。因此党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入军队、政府和学校等部门,采取尊重、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创办各类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系统传授中国革命理论。^[22]这些措施壮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力量,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李合敏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途径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其成为坚定的革命信仰者。^[23]此外,党还进行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民主党派创建的工作,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以身作则,提高了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效性,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4. 儿童教育的研究

战争使中国许多地区的孩童失去了家庭,流离失所,面对这种境况,党建立了儿童保育会,挽救遭受苦难的儿童。以此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对儿童的民族精神教育也以保育会为依托得到开展。学者们重点从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两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儿童教育进行了研究。

就教育体制而言,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儿童保育会,并实行集体保教模式保证了儿童教育的顺利实施;而教育内容主要以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反奴化教育、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教育为主。张纯指出战时儿童大多受到战乱之苦,对日寇有着很深的仇恨意识,且因来自不同阶层,部分儿童有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因此在教育过程中,主要以培养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础,对儿童进行抗战建国能力的培养,以锻造健康体魄与人格为原则,特别注重启发儿童的爱国意识、民族自尊,强调通过劳动来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的抗战建国人才。^[24]何成刚、李杰从历史教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儿童教育中民族

意识的培育,并指出当时教科书内容的设置并不相同,多数取材于当地,旨在“发扬儿童爱家爱乡的固有精神,养成爱国爱群的志愿。”^[25]党的民族精神教育政策“在保育革命儿童,解放妇女,解除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为抗战建国培养了人才的过程中,为儿童教育理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26]

三、抗战时期中共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的启示

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是特殊时期下的应激性教育活动,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学者们从民族精神教育的作用、民族精神培育的全面性、民族精神教育途径多样性等方面对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的启示进行了研究。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传统民族精神思想的时代体现。当今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实践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易向农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正确看待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善于挖掘民族精神的合理内核,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认为民族精神只有与时代潮流相匹配,才能够掌握群众的力量,因此他强调在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要注重维护群众的利益,紧抓时代主题,促进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提高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积极性。^[27]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教育取得实效性的有力保障。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把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的开展作为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途径等问题都做出了具体的指示。^[29]因此,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将民族精神教育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环节,加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依靠党、政、军及社会团体全方位开展民族精神教育。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利用各种组织力量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取得了实效:“青教会干部要保证60%入冬学;妇救干部和工会干部,保证50%入冬学。”^[29]当今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多在高校开展,大都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育方式,辅之小型校园宣传活动。类似石家庄铁道大学利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柏坡进行了长达20

多年的现场实践教学或井冈山大学将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野外生存教育的课外实践仍属于少数,大量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30]社会团体力量并未达到高效利用。

四、结语

通过对十年来关于中共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学术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一是学术界对中共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的研究体系逐步完善,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特殊内涵到教育实践中的制度、内容、原则、途径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二是依据教育主体的不

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活动进行了探索,成为研究的重点。

纵观当前对中共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研究的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深入研究。一是对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研究,学者多从某一个角度切入,缺乏整体性。纵览现有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以某一区域为依托,具体研究了特定教育主体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途径、作用,而系统性地研究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教育实践者极少。二是探究中共在抗战时期民族精神教育实践的当代启示较少,大多体现在对某个特定教育主体的研究中,缺乏系统性。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0.
- [2]汪华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0.
- [3]郝世奇.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论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7):1-2.
- [4]李向军,危兆盖.论抗战精神[N].光明日报,2005-08-30.
- [5]熊德洋.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日精神[N].广西日报,2005-08-25.
- [6]朱童心.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和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6-18.
- [7]罗永辉.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干部教育史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 [8]康厚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2.
- [9]熊维强.论毛泽东干部思想的主要内容[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4):27-29.
- [10]王艳春.论抗战时期在职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J].孝感学院学报,2007(5):64-67.
- [11]吴宏亮.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党员教育的历史经验[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1):47-50.
- [12]刘志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队干部教育工作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36-41.
- [13]潘泽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建军思想的创新发展及启示[J].军事思想史研究,2014(6):38-42.
- [14]曹云生,吴晓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民主建设研究[J].求实,2005(10):21-24.
- [15]李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冬学教育简论[J].党史博采(理论),2013(9):5-9.
- [16]周耀宏.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1.
- [17]刘庆礼.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运动的特点和经验——以冀东抗日根据地为例[J].农业考古,2015(3):54-57.
- [18]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J].抗日战争研究,2014(3):57-73.
- [19]孙瑞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教育[D].延安:延安大学,2013.
- [20]曲晓鹏.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权益问题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06(2):117-140.
-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5-566.
- [22]唐景成.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
- [23]李合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6):43-48.
- [24]张纯.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 [25]何成刚,李杰.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的主旋律[J].中学历史,2005(7):15-19.
- [26]于美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以保育机构为中心[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4.
- [27]易向农.论中华民族精神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弘扬、发展与启示[J].福建党史月刊,2005(7):34-37.
- [29]白鹤.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及其启示[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3-45.
- [30]孙炳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红色文化研究述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49-54.

Review of the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Research of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Past Decade

Yin Mengjie, Sun Bingfang

(College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iri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iritual suppor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various researches as to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PC's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practi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s.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these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ecific subject's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practi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less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CPC's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practice, which seems a bit monotonous and lacks integrity.

Key words: Anti-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上接第 67 页)

参考文献:

- [1] 查姆·伯曼特,冯玮译.犹太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26.
- [2] 刘立勇.《麦田里的守望者》禅宗顿悟探析[J].芒种,2012(24):80.
- [3] 塞林格,李文俊,何上峰译.九故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4] 李杰.误入塞林格的牢笼[EB/OL].<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068124/>.
- [5] 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62.
- [6] 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守望麦田:塞林格传[M].史国强,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322.
- [7] 寇旭华.从个体与异化社会的二元对立到超越对立——J.D.塞林格小说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 [8] 塞林格,丁骏,译.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82.

Salinger's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His Works

Liu Liyong, Li Land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Born in a Jewish family, raised in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obsessed by oriental religions, Salinger overcame the one-sidedness and limitation of any single religion, transcended one-dimensional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nd finally formulated a unique mode of humanistic concern when his above-mentioned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collided and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Both Salinger and his characters, entangled in the course of the evolv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such different religious faith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inally achieve a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ir inner self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der the guidance of oriental religions and by adopting religious pluralism.

Key words: Salinger;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reflection; self-redemption